

夏 初 惠 玲 校释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蒙学十篇

三字经
千字文
名贤集
弟子规
神童诗
小儿语
增广贤文
闺训千字文
改良女儿经
朱柏庐治家格言
二十四孝
百家姓

9.299

蒙 学 十 篇

夏初 惠玲 校释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蒙 学 十 篇

夏初 惠玲 校释

* *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140千字
1990年10月第一版·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 303 01114 5 G · 662

定价：3.50元

目 录

序	王炳照 (1)
三字经	(17)
千字文	(34)
名贤集	(51)
弟子规	(71)
神童诗	(85)
小儿语	(103)
增广贤文	(108)
闺训千字文	(140)
改良女儿经	(156)
朱柏庐治家格言	(172)
附：二十四孝	(177)
百家姓	(190)

序

王炳照

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儿童教育，自儿童出生起就注重其道德的培养和知识的增长。所谓“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就是要求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施以正当的教育，或者说，要及时地用正当的教育启迪儿童的智慧、培育儿童的品德，使之健康地成长。所以，中国古代称儿童教育为“童蒙教育”，或“蒙养教育”。

中国古代的童蒙教育，始于周秦。儿童出生后，即接受“保傅之教”，七八岁之后，“出就外傅”，接受蒙养教育。汉唐时期，童蒙教育的实施，已基本趋于成熟阶段，广泛推行于宫廷内部和某些达官贵人的家庭。宋代以后，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般庶民子弟也多能受到蒙养教育。

中国古代童蒙教育的基本目标和主要内容是对儿童进行初步的品德训练和基本文化知识教学。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蒙学教材，既是实现童蒙教育目标的物质保证，又凝聚着童蒙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晶。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写，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周秦以来，各朝都编写过一些有影响的蒙学教材，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编写经验。

根据有关的历史资料和现存的蒙学教材加以考察，可以

看出，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周秦至汉唐。这一时期的蒙学教材多为综合性读物，以识字为主，同时进行品德教育，并包含各方面的知识。最早的蒙学教材是字书《史籀篇》，据说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汉书·艺文志》）秦代李斯作《苍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胡毋敬作《博学》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

“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元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汉书·艺文志》）其中，以《急就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急就篇》是一部以识字为主，包括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读物，深受一般民众及其子弟的欢迎。《急就篇》全文叶韵，有七言、四言、三言，包括陈说姓名，介绍丝织、植物、动物、农产品，自然常识、疾病医药、身体器官、乐舞礼器、官称名称等各种杂物品类，真象一部小百科全书。由于唐代以后，蒙学教材增多，并且《急就篇》的某些内容已显陈旧，所以，“自唐以下，其学渐微。”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后来的《百家姓》、《史姓韵编》、《名物蒙求》等，正是《急就篇》的进一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蒙学教材出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除《急就篇》之外，有蔡邕撰《劝学》一卷，晋著作郎束皙撰《发蒙记》一卷，晋散骑常侍顾恺之撰《启蒙记》三卷，梁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此外，还有多种字书，如：《杂字指》、《俗语难字》、《杂字要》等，可惜多已亡佚。但这些杂字书对后世影响甚大。其中，流传最久远而广泛者首推《千字文》。

唐代的蒙学教材有三种值得注意。一是《开蒙要训》，也是全文叶韵，四言为句。现仅存《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影印的五张残页。二是《太公家教》，李翱《答朱载言书》、王明清《玉照新志》、胡仔《渔隐丛话》、陶宗仪《辍耕录》都提及此书。三是《兔园策》（《兔园册》）。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书》的《兔园策府残卷提要》中称：“《宋史·艺文志》有杜嗣先《兔园策府》三十卷。……《兔园策》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王伯厚（应麟）《困学纪闻》云：《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宋太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此书盛行于五代，或至宋季尚存。”

第二阶段：宋至清中叶。这一时期的蒙学教材在前代基础上有许多新发展和新特色。第一，蒙学教材由综合性读物向分类专写的方向发展。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日用常识，渐有专书。原有的综合性读物仍被选用，内容也有所扩充和增补；第二，在以识字为主的基础上，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大大加重。尤其是随着宋明理学思想的发展，传播性理学说的内容显著增加。第三，随着农、工、商子弟入学增加的需要，农工商各业实际知识和实用技艺，以及生

活日用常识逐渐充实到蒙学教材中去，各种杂字类蒙学教材继相涌现，并得到广泛流传。第四，识字教材更加适合汉字特点。在普遍采用韵语体裁的基础上，更采用了对偶句式。句式对偶、整齐，不仅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便于记诵，而且在内容上或连类相及，或同类相聚，或异类相衬，给人印象鲜明，久久不忘。第五，更加注意适应儿童的特点和兴趣，故事性加强，附有精美插图，采用诗歌形式，使蒙学教材更加生动活泼，有极强吸引力，得到最佳使用效果。

宋代以后的蒙学教材，大体上可分为五类，在内容上多有侧重。第一，综合性的蒙学教材，以《三字经》为代表。此外，还有《百家姓》、《千字文》也属此类，统称“三、百、千”。其流传时间较长，范围也最广。第二，专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教材，以《性理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名贤集》、《增广昔时贤文》等为代表。第三，历史知识类蒙学教材，有《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小学》、《童训》、《少仪外传》等。第四，诗歌类的蒙学教材，有《训蒙诗》、《小学诗礼》、《童蒙须知韵语》。尤其是《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第五，专讲成语典故、名物制度常识的蒙学教材，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

此外，还有专门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如：《女小儿语》、《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女四书》（包括《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等。内容多为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包括部分女子日常生活常识的内容。

第三阶段：清中叶民国初年。这一时期已是新式学堂建

立，新型教科书编辑的开始，仍有扩充传统蒙学教材出现，如《三千字文》、《万字文》、《千家姓》等；也有改写蒙学教材问世，如章太炎（炳麟）先生的《重订三字经》。他在《原序》中说：“《三字经》者，世传王伯厚（应麟）所作。其叙历代废兴，本迄于宋，自辽金以下，则明清人所续也。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校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即《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余观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经义、知史法，其犹使眇者视、跛者履也欤！今欲重理旧学，使人人诵诗书，窥纪传，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间常举以语人，渐有信者。然诸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有未具，明清人所增尤鄙。于是重为修订，所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以付家塾，使知昔儒所作非苟而已。”反映了民国初年，面对新式学堂所编教科书不尽如人意而产生的某种怀旧心态，以及对新型教科书未能吸收和继承传统蒙学教材的优秀遗产而一味赶时髦、搬洋书、丢弃民族特色所引起的忧虑心情，不可简单地斥以“复古”。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曾发现：许多农民不欢迎新式学堂，因为新学堂尽说些城里话，不切实用，而宁可欢迎私塾先生，因为可以学会记帐、写信、写春联等日用知识。传统蒙学读物比新式教科书更有用处。也有人试图借用传统蒙学教材的形式融入现代知识的内容。这些努力终因时代进步而徒劳无功了。

现在付梓刊印的《蒙学十篇》，包括：《三字经》、《千字

文》、《名贤集》、《弟子规》、《神童诗》、《小儿语》、《增广昔时贤文》（简称《增广贤文》）、《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朱柏庐治家格言》。又选《二十四孝》、《百家姓》作为书后附录。

这十种蒙学教材及两种附录蒙学教材，虽不能体现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历史发展，也未能展现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全貌，但就其流传时间较久、范围较广、影响较深而言，仍有相当的代表性。就内容而言，这十种及附录二种多属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其他如历史知识、日用常识、名物典故、成语民谚之类均未选入，这虽令人有不足之感，但也有助于窥见古代蒙学教材，特别是宋代以后的蒙学教材的一种主导倾向。

《三字经》是古代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它流传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三字经》相传是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编撰的（也有人说是宋末区适子编撰的）。全书结构谨严、文字简练，概括性极强；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数成句，句句叶韵，读来琅琅上口；通俗易懂，便于记诵。许多人少年读过，竟终生不忘。全书仅千余字，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先讲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接着讲伦理道德规范、名物常识、经史诸子、历史次第、勤勉好学范例。许多语句，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代代传颂、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被誉为“千古一奇书”。特别用三百字概括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变迁、朝代更迭、帝王兴废的历史，真乃“袖里通鉴纲目”。《三字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有人增补，更有人仿效而作各类“三字

经”，如：《历史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等。有趣的是，毛泽东同志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题词也借用了三字经的体例。这里选印的是民国初年增补过的《三字经》。

《千字文》为梁武帝时周兴嗣所著，全书千字，四言叶韵，共二百五十句，无一重复字。本书以识字为主，包括天文、史地、动植物名称、农业知识、道德规范，还吸收了不少民间流行的成语谚语，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记诵，切于实用，流传久广。特别是书中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对农业生产知识的推广，成为该书特色，也是其可贵之处。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治本于农，务兹稼穡，俶载南亩，我艺黍稷”。将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纳入蒙学教材，是值得称道的。

《名贤集》的作者不详。从内容上分析，是南宋以后儒家学者撰辑。本书汇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以及民间流传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格言谚语加以选择提炼而成。句式对偶整齐，不拘字数，但句句叶韵，读来顺口，听来悦耳。有四字为句，五字为句，七字为句，如：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家贫知孝子，国乱识忠臣”。“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字千金价不多，会文会算有谁过，身小会文国家用，大汉空长做什么”。这些格言、名句、谚语成句多富有

哲理性，耐人寻味，给人启迪。当然也有许多消极、没落的内容，如：“官满如花谢，势败奴欺主，命强人欺鬼，运衰鬼欺人。”“有钱便使用，死后一场空。”

《弟子规》是清代李毓秀撰辑，原名《训蒙文》。经贾有仁修订后，改名为《弟子规》。它是以学规、学则的形式对蒙童进行学习指导和品德修养的启蒙读物。全书以孔子《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章为总纲，分为数节，各选择《论语》、《孟子》、《礼记》、《孝经》和朱熹语录纂辑而成。三言成句，句句叶韵，仿《三字经》体例。通俗易懂，备受欢迎，不仅在私塾、义学为必读之书，而且在祠堂、茶楼、市井广泛流传，被誉为是“便于诵读讲解而皆切于实用”的“开蒙养正之最上乘”，在清代大有取代《三字经》之势。清人周保障在《童蒙记诵编》中说：“近李氏《弟子规》盛行，而此书（指《三字经》）几废。”可见影响之大。

《神童诗》既是以诗歌形式对儿童进行品德、知识教育的蒙学读物，又是教儿童习作诗歌的示范教材。据明末学者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考证：宋朝汪洙，浙江鄞县（宁波）人，官至观文殿大学士。据说他在八、九岁时就善诗赋，自称“神童”。后有人将他幼年诗作铨补成集，题为《汪神童诗》。在流传过程遂直称《神童诗》。其实，《神童诗》并非汪洙一人之作，也非尽为儿时作品，如：《神童诗》中至少有两首为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所作，还有南朝陈国末代皇帝陈叔宝的诗。《神童诗》采用按诗的内容分类编写的方式，首选“劝学”诗，计十四首；继选“状元”、“言忠”、“帝都”、“四喜”、“早春”、“春游”、“暮春”、“寒食”、“清明”、“纳

凉”、“秋夜”、“中秋”、“秋凉”、“七夕”、“登山”、“对菊”、“冬初”、“季冬”、“除夕”等十九类。全书共选二十四首，包括劝学、得第、为官，以及四季景物，节日礼仪等的描写。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对仗工整、平仄准确，读起来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背诵，因而流传不衰。明清时期又有人仿《神童诗》，在宋代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的基础上，选编成《千家诗》。又有王相选注的《新镌千家诗》和署名谢枋得撰《重订千家诗》。《千家诗》流传也极广，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千”，列为明清时期使用最广泛的四种蒙学教材。

《小儿语》，还有《续小儿语》，是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编选的。该书选取流行的格言、谚语，均以白话写成整齐而有韵律的警句，分四言、六言和杂言，皆浅显易懂，儿童乐闻喜读。主要内容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如：“一切言动，都要安祥；一差九错，只为慌张”，“自家过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儿小任情骄惯，大来负了亲心；费尽千辛万苦，分明养个仇人”。哲理性强，又富亲切感，所以甚为流行。此外，还有专为女子编撰的《女小儿语》。

《增广贤文》，全称为《增广昔时贤文》，与《名贤集》、《小儿语》同属一种类型的蒙学读物，主要用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流传于明清时期。

《闺训千字文》和《改良女儿经》，是专为女子编写的蒙学教材，教育女子守妇道、习女事，成为贤妻、良母、孝女、节妇。《改良女儿经》影响更大。明代已有《女儿经》在民间刊行流传，并有人不断增删。主要版本有明万历、天

启问赵南星加注刊印本，署壬戌初冬天津高氏《裘氏女儿经》。清同治间贺瑞麟订正的《女儿经》和《改良女儿经》。该书以三言韵语的形式，纂集儒家学者的有关言论，配以历代被推崇赞颂女子的典型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情节。主要贯穿着“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如：《改良女儿经》开宗明义称：“遵三从，行四德，习礼义，难尽说，看古人，多贤德，宜以之，为法则”，“最不孝，斩先脉，夫无嗣，劝娶妾，继宗祀，最为切”，成为全书的总纲。但也有一些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事的基本规范训养，如：“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又如：“守淡薄，安本分，他家富，莫眼热，行嫉妒，损了心，勤治家，过光阴。”这类读物通俗易懂，语言合辙押韵，故事情节生动感人，深受“村姑里妇”喜爱。与《闺范》、《女小儿语》、《女儿经注》比较，在内容上减少了许多极端迷信荒诞的部分，从而增加了吸引力和可信性。

《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家训式的家庭教育材料，多悬于厅、堂、屋、室，并非教材或读物。严格地说，不属于蒙学教材。但家庭教育中对子女教育是重要对象，因此，对童蒙教育有较深广的影响，因此，加以选译，以备参阅。该篇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官宦士绅、殷实富户以及书香世家津津乐道、倾心仰慕的治家良策，成为正齐门风、振作家声、炫耀乡里、名垂后代的范例。文中贯穿着士绅生活的孤芳自赏、清高闲适、与世无争、好自为之的情趣；也包含着许多治家处世的质朴哲理和有益启示，为勤俭持家、爱护劳动果实、注意清洁健康、邻里和睦、合家欢乐等。

为了便于阅读，所选十种蒙学教材，均逐句译成现代汉语，并加了部分简要的注释。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蒙学教材本身的一大特点就是通俗易懂，有的甚至是直接用白话文编写的，因此，本来是不必翻译就可读懂的。而且翻译起来难度极大，翻译得准确贴切更属不易，常常陷入费力不讨好的窘境。但考虑到，毕竟这些材料已是百余年至数百年以前撰辑的，与今人的知识结构、语言习惯有较大的差距，提供翻译材料也还是会给人以某种便利的。不过，还是以直接阅读原文为好，不必或尽量不看翻译文字，对译文的质量也不必过分究考。

附录二种，只将原文刊印，不作译注，并分别加了详略不同的简介，以备参考。

那么，现在重新选印这类读物究竟有什么价值呢？或者说，读者可以从这类读物中能够获得什么教益和启示呢？这是一个看来简单，实则异常复杂的问题。我只能根据自己重读这些读物片断感受，谈点浅薄粗俗的看法。

第一，有助于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理解。周谷城先生在1985年为湖南岳麓书社编辑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所写的《序》中说：“岳麓书社准备整理出版《传统蒙学丛书》，我极表赞成，因为这是一件大有益于文化史研究的事情。”他具体分析道：“我们研究文化史，应当着眼全民族和各阶层人民文化的演进，着眼以往各时各地社会上多数人的文化状况。所以，研究唐五代文化，除了《北堂书钞》、《监本九经》，还不妨研究研究今存《兔园册》（即《兔园策》或《兔园策府》）残篇；研究宋代文化，除了《困学纪闻》、《剑南诗稿》，也不妨研究研究《三字经》和《百家姓》”，因为

“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他又指出：“当然，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蒙学书，同样属于封建文化的范围，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但无论如何，它们绝不比庙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这是颇有见地的论述。我们阅读《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神童诗》等，确能增加对宋代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感性知识和具体感受。在这些普及于“田夫牧子”、“村姑里妇”之中的蒙学读物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社会心态、文化心理、生活习俗、道德风貌、民众性情，可以看到人们的理想和追求，人们欢乐和忧愁。如：《三字经》结尾有：“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神童诗》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名贤集》有：“家和贫也好，不义富何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弟子规》有：“惟德学，惟才艺，不如人，当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这些生动具体材料是一般经史文典中难以觅寻的，而在蒙学读物中却俯拾皆是。因此，这些蒙学读物就成为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宝贵参考资料，甚至从中还可窥见当代中国社会某些社会心态、文化心理、社会风尚，以及国民性格形成、演进的若干蛛丝马迹。

第二，对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阅

读和研究蒙学教材可以获得丰富而具体的教育发展史的资料，特别是可以了解蒙养教育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状况和进程，更可以探讨蒙养教学的规律和蒙学教材编写的经验。

我国教育的发展由原始形态时社会全体成员普遍接受萌芽阶段教育，发展为专门设学立教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又分化出大学教育和小学教育；在官学之外又发展了私学、家学。蒙学教材的出现，反映了全社会对童蒙教育的普遍关注。南宋大教育家朱熹深刻地论述了小学教育（即蒙学教育）的重要地位。南宋以后蒙学教材大量涌现，正是适应并推动了蒙学教育的发展。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写有近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从阅读这里选译的十种蒙学教材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独有特色，并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和总结蒙学教材编写的经验。

统观这十种蒙学教材及二种附录蒙学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周谷城先生在《〈传统蒙学丛书〉序》上也作了简要的说明：“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1. 知识教学与品德培养紧密结合。有的蒙学教材侧重知识教学，甚至重点在教识字，但也设法灌输一定的思想内容和品德要求。如《百家姓》、《千字文》。有的蒙学教材侧重进行品德培养，但不忽视知识教学，如《三字经》、《名贤集》、《弟子规》等，都有丰富的知识性。人们称《三字经》“若能句句知诠释，子史经书一贯通，”成为一部集萃古代文